

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难道我们真的把市场经济
正确运行的规则和民主法治的
真谛学到了吗？学到可以从心
所欲进行再创造的地步了吗？
难道我们真的已经把列圣先贤
教导我们的把社会责任置于个
人利益之上的道德规范践履躬
行，「无丝毫亏欠」了吗？

李慎之

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李 慎之

我相信：天地生人，或者说宇宙用
几百亿年的时间进化出人类来，不是为了毁灭他。

我相信：既然连最低级的细胞都有
自组织的能力，人类社会也一定有自组织的能力。

我相信：科学技术还会继续发展，
最后仍然能给人以力量来解决它自己造成的问题。

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
自从 1492 年哥伦布远航美洲使东

西两半球会合之时起，全球化过程已经开始了，为什么现在才说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呢？这是因为在过去 500 年中，我们看到的还主要是国家力量的伸张，民族利益的碰撞，宗教的传播，文化的渗透……总之，还只是局部力量的会合而引起的冲突和融和。而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超国家的、超国界的、全球性的力量在行动，全球性的问题在蔓延。

从 1989 年柏林墙的坍塌到 1991 年苏联的瓦解，到 1993 年欧洲统一市场的形成和 1994 年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的倡议的纷纷出台，可以说是这样一种转折的分界线。

世界上人口最多、领土最广的国家——中国、印度和前苏联各共和国几乎同时卷入了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大潮，至少在经济上，主动地开始“照国际惯例办事，与国际惯例接轨”了。

经济也许应该算作物质层次的现象，而在思想的领域，就在这几年，信息的传播已经可以以无间隔的速度到达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几乎可以不留下任何死角。1989 年到 1991 年所发生的事情，事实上可以解释为信息的力量冲破了封闭的壁垒。而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又提出了要在下世纪初建成信息高速公路的计划，到那时，世界上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几乎都可以随时取得他们所需要知道的任何信息。叫了二三十年的从工业化时代向信息化时代的转变，看来就要在公元二千年之交实现了。

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与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应该说是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标志，还有许多其他的标志：环境污染的全球化，人口爆炸以及由之而来的移民问题的全球化，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武器扩散所造成的对全人类的威胁，恶性传染病、毒品买卖与犯罪活动的全球化……甚至垃圾处理都成了全球性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 1992 年联合国

日致辞时说：“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时间正好离 1492 年 500 年。

全球性的时代已经到来，全球化的过程方兴未艾。

从进化论（不但是生物进化论而且是宇宙进化论）的立场来看，全球化是值得欢迎的。而且毋宁应该说，不论你欢迎不欢迎，它都是必然要到来的，既无可反对，也无法回避。然而，只有未来的（比如说，200 年后）的人类才能简单地作这样“价值中立”的判断，对于我们这些活在今天的世界上而且被“裹胁”进入“加速全球化”（以区别于过去 500 年间慢吞吞地全球化）时代的人来说，全球化过程带来的决不仅仅是愉快欢乐，而且还要带来许多的烦恼痛苦，因为它不但会带来融合与和谐，还会带来摩擦与冲突，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血与火的斗争，是生与死的抉择，虽然世界大战的惨祸也许可以避免。

“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是《三国演义》开宗明义的话，也是中国多数人信奉的历史哲学。用这话来观察全人类的历史，同观察中国历史一样贴切。自从几百万年以前地球上出现了人类以来，总的说来是分的趋势。出于求生的需要，人们越走越开，越走越远。然而地球是圆的，到了距今 500 年前，这种趋势倒转过来了，人类又走到一起来了。不过正如从汉的“分”到晋的“合”一样，中间不知经历了多少残酷的场景：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只是其中最突出的几场而已。因此全球化过程决不会是太太平平的，这是我们必须看到的第一点。

我们必须看到的第二点是，加速全球化的最大推动力从来就是市场经济。就其本质来说，市场的力量是决不承认任何界限的。只要有利可图，它就会像水银泻地那样无孔不入。它在

过去已经冲破了许多部落的、民族的藩篱，今后它还要冲破更多国家的、地区的、种族的、宗教的、文化的界限。对于那些比较适应了市场经济的国家，困难当然可能小一些；而对于那些新近才引入市场经济的国家来说，痛苦就会很多，抵制也不难想见。正因为如此，西方才有一些忧时兼自忧、警世兼自警的理论家预测：我们这个地球上会发生所谓“文明的冲突”。这种冲突范围的广度与激烈的程度还要走着瞧。总之，全球化的过程将冲破文明的界限是没有问题的。它将证明人类社会不是一个拼盘，而是一个系统。

还要看到第三点。市场经济就其积极面讲，它的伟大的作用就是解放了个人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因而大大促进了财富的增值；而就其消极面讲，它利用的正是人原始的利己心，是人对物质享受似乎永远不会满足的贪欲。正因为如此，它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增加了个人可能得到的自由度；它也把牛仔褲和可口可乐、迪斯科和摇滚乐……同海洛因和艾滋病一起传播到世界。它打破了自古以来多数人已经习惯而且视为当然的生活方式，却还来不及给他们带来应有的新秩序。

就这样，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今天的世界陷入了价值观念空前的大失落和大混乱之中。

在所谓的西方（也就是发达国家），新思潮层出不穷。现代主义没有热闹够，就出现了后现代主义。曾几何时，后现代主义又像已不时行，恨不得再玩玩后现代主义了。思想的模糊和语言的贫乏使人们能诉之于后 X、后 Y、后 Z，可是这既解救不了世界，也解救不了自己。

这个世界上一方面固然并不缺少各色各样的后 X、Y、Z，一方面却又出现了原教旨主义的勃兴，不但有广为人知的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也有印度教的原教旨主义，以至东正教的、

天主教的、耶稣教的、儒教的原教旨主义……虽然人们大多只注意到这种现象存在于发展中世界，但事实上它也以各种极端王主义的形式、还有亚宗教的形式在发达国家中蔓延。

人的灵魂在过去与未来，在前进与后退之间彷徨、挣扎、煎熬。

这就是人们现在都已看到而且感到的全球文化大危机。这个危机之所以是大危机，是因为它不仅表现在诸如教育事业的衰败、出版行业的不景气、文学水平的低落、画家画不出好画、音乐家作不出好曲子、科学碰到了逻辑的和实验的限界等等，而且表现为所谓“文化”的核心之核心——道德水准的持续下降上。传统的价值失落了，能够维系人心、安定社会的新的价值标准还不知在哪里。

世界上不少先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仅以美国而论，保罗·肯尼迪是一个，小阿瑟·施莱辛格又是一个，预言“文明的冲突”的塞缪尔·亨廷顿也算一个。不过他们大多不肯明言问题的症结，也开不出救治的药方来。大胆的狂人当然也并不缺少，欧洲的新法西斯分子和新纳粹分子就是，然而听了他们的话，世界只会更快地堕入更深的灾难。

历来重视自己的文化的中国人，从上个世纪起就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国家的文化危机了。这是因为大体上从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碰到了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指的是传承了 3000 多年的中国文化——包括经济、政治与生活习惯在内的广义的文化——要向一种全新的文化转变，本来还只要向工业化时代的文化转变，现在还要加上向信息时代的文化转变。中国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多么激烈而痛苦的过程，真的是交织着光明与黑暗，前进与后退，成功与失败……

可以使我们欣慰的是，我们现在可以有把握地预言，中国

的转型期将在鸦片战争大约 200 周年的时候底于完成。因为中国已经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而且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这是了不起的成就——用 200 年的时间走完人家走了四五百年的道路。

但是，不能忘记 200 年间多少仁人志士以至广大民众所经历过的希望与失望；不能忘记我们所付出的代价，而且还有困难在前面，还有代价要付出。

回过头去看，许多先行者提出的方案，不论是维新还是救亡，不论是三民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也不论是搞世界革命还是与国际接轨，统统都为的是走上全人类都要走的必由之路——全球化之路。

我们相信中国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即将完成，只是好比说，我们在打通一座大山的时候，知道我们离出口已经不远了。但是隧道尽头的光明不但不能使我们歇脚停手，更不能使我们忘记前面还有塌方的危险，流沙的危险，洪水的危险……“行百里者半九十”是中国先哲有益的告诫。事实上现代化仅仅靠市场经济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建立现代化的道德秩序，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种礼崩乐坏，上无道揆，下无法守的情况。人们可以把这认为是转型期的自然现象，但是如果不加救治，后果只能是“不堪设想”。

人类的价值观念历来是有变化的，但是最核心最基本的要素总是普遍而永恒的。中国人历来追求的郅治都要求“淳风俗，正人心”，可是现在的普遍心理是“向钱看”，为了钱什么都可以不顾，什么都可以不管。中国古人历来鄙视为机会主义者的“弄潮儿”，现在居然成了时代英雄。所谓痞子文学，其精义无非是鼓吹“何不游戏人间”；“何不潇洒走一回”？什么

价值标准，什么仁义礼智信，什么艰苦朴素，统统见鬼去吧！”
“什么立诚推仁，什么居敬主静，什么希圣希贤，你算老几？”
然而难道中国人在失去了所有这些传统的价值观念之后，真的就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么？难道 12 亿中国人能就这样稀里哗啦地走向全球化的世界么？

“不能”，答案只能是否定的。如果中国人不能继往开来，建立上承旧统而下启新运的道德秩序，我们就将既不能实现现代化，也没有资格在全球化的未来世界上占有一个尊严的位置。

尤其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在中国即将完成自己的转型期的时候，世界也正进入一个更大的转型期——由工业化时代转入信息化时代的转型期。换言之也就是中国的价值观念大混乱的时期刚好与世界的价值观念大混乱的时期重合。有道是：“过了一关又一关，山外还有山连山！”

幸乎，不幸乎？我们以两点论来看问题：它既是坏事，也是好事。可是我们致力的方向只有一个：尽力尽快把坏事变成好事。

全球价值观念大失落、大混乱的原因，从最根本处说，其实是跟中国价值观念的大失落、大混乱的原因是一样的，它同样出现在历史大转弯的关头。远的不说，即将过去的 20 世纪虽然给人类带来了两场惨痛酷烈的世界大战，它毕竟把全球工业化的时代推向最后阶段，把市场经济普及到了全球，把科学技术推广到全球，把人类财富的总积累提高到只要使用得当就可以迅速改变一个或者几个国家面貌的程度，把生产力发展到有可能满足全人类基本需要的程度，把个人的自由度提高到空前未有的程度。但是它也给世界留下了文化堕落、道德败坏，贫富差距扩大，霸权主义与民族利己主义同时存在，种族

主义以及文化摩擦在世界范围内和各个国家内部同时凸现，人口膨胀与环境破坏的矛盾看来竟像是一个打不开的死结……面对这种新的局面，人类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他们既不知如何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也不知道如何正确地利用新开辟的可能性。七八十年代曾在中国大陆引起强烈关注的“三信危机”，现在遍及全世界。首先突出地表现在历来自以为富裕繁荣、文明先进的西方：社会涣散，家庭破裂，儿童失教，青年放纵……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统计数字表明，犯罪率、自杀率、精神病发生率与失业率一起持续上升，人们（首先是世界前途所系的青年人）失去了信仰，对政府和社会权威缺乏信任，对前途没有信心。

正因为如此，最近去世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他身后发表的文章中说：“今天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也是最强大和富裕的国家。……然而，虽然我们在物质上是富有的，但是我们在精神上是贫穷的。”（美国《新选择》月刊 1994 年 5 月号）

发达的国家是如此，不发达的国家呢？在最贫穷的非洲大陆，一位当地的学者哈桑·巴认为，当前非洲战乱不止的一个原因是：“这些社会已经在殖民化和现代化期间丧失了他们原有的传统价值标准，它们已经不再拥有本国本土能调节各种冲突的机制，已不再有精英人物来考虑教化对立的各方。……人们忘记了人文的准则首先是由一个社会在其历史过程中的民族价值观念形成的浓缩物。”（法国《解放报》1994 年 4 月 25 日）

再听听联合国前秘书长德奎利亚尔的话：“发展决不能理解为仅仅限于物质享受方面的补充。”“我们现在的以不断扩大物质消费为主的发展方式，既不是行得通的，也不是可以无限

延伸的，它们不仅在破坏文化的结构，而且还对生物圈构成了威胁，因而也就是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威胁。”（法国《世界报》1994年2月25日）

一切迹象都指陈，发生了文化危机，或者（就其本质来说是）价值危机。旧的道德秩序崩溃了，新的道德秩序还没有能建立起来。

危机是全球性的，这种认识使我们感到沉重，因为在八面来风的情况下，要解决中国自己的文化危机会更加困难。但是也可以给我们以希望，因为在着手解决我们自己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全球大趋势的助力。

上面引证的德奎利亚尔的话，是他在1992年年底才成立的世界文化发展委员会在1994年年初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讲的。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重新考虑文化的概念本身，应当深化文化和发展之间的联系”。据他说：“以前从来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做过一件事。”他问道：“为什么不可以设想在全球范围内搞一个文化发展方面的马歇尔计划呢？”

把现在的西方社会称做“病态社会”的美国《未来学家》杂志说：“西方现代文化正在危害我们的精神健康。这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建立一整套新的价值标准和信仰体系。西方现代文化与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其他严重问题之间的关系，使得这件事情显得更加迫切。”（《未来学家》1993年11-12月号）

我们中国人应当欢迎，应当支持这种努力，但是，我们不当等待或者单纯依赖他人而不首先自己从事这种努力。中国人不能做“待文王而后兴”的人。

在这方面，我们中国人是有优越的条件。

孔孟之道历来被认为是一种政治——伦理哲学，它可以成为我们重建道德秩序的精神支柱（俄国人就羡慕地说“要是俄

罗斯也有自己的孔夫子就好了”。〔（新时代）1993 年第 39 期〕。中国的多数哲学流派——不论是儒家、道家、佛家都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都要求个人把社会责任置于一己的私利之上。它们都可以帮助我们从今天的各种各样的矛盾与混乱中自拔自立。

康德这样的思想家认为自己毕生的奋斗目标就在于提高人的地位，然而正是中国的先哲把人的地位看得最高。《孝经》上说：“天地之性人为贵”；《礼记》上说：“人者天地之心也。”这就是说，人是宇宙的自我认识、自我觉悟、自我发展。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来自于天地，来自于宇宙；人当然有能力拯救自己。

1993 年夏天，我在美国看到一本专门从事中国研究的杂志，上面有一篇文章说：“在中国面临的各种危机中，核心的危机（THE CORE CRISIS）是自性危机（IDENTITY CRISIS）”，“中国人正在失去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中国性（CHINE SENESESS）。”我为这种观察的深刻与批评的尖锐所折服。然而我相信，“我们中国不会永远这样下去的”。^①我们一定会找回我们迷失的“自性”的。

不可否认，这是一个极其伟大的也极其艰巨的工程，我们甚至不敢说是不是已经有人在着手了。外国人看到了我们的问题，然而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呢？四顾茫茫，旷野里偶然传来几声微弱的呼喊，却听不到多少回声。“物极必反”是古训，是天道，难道事物还没有到“极”，因此也不会“反”么？我怀疑……

奇怪的是，虽然重建中国文化的事业还谈不上什么成就，我们的社会风气和道德水准还在继续滑坡，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振兴，虽然还只有少数几个人手里有几个钱，一种虚骄之气

就已经在冒头了：“中国《易经》天下第一”，“中国气功举世无双”，“21 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以后是咱们的天下”。

今年春节电视台迎春晚会的节目中，有一位刚刚装上了电话的农村老大娘喜滋滋地跟她在大洋彼岸求学的孩子打电话。做娘的心疼孩子为筹措学费而不得不打工，怜惜地说：“等你学好了，把咱国家建设好了，让他们也给咱们洗盘子洗碗来。”

这是极其粗鄙的民族主义，是完全违反全球化的趋势与精神的，也是违反中国的传统的。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才是咱们中国的精神！

去年年底（11 月 23 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香港举行的世界华商会议上说：“海外华人在取得成功的时候，必须提防华人沙文主义……在中国趋向繁荣和强大的时候，这一点更为重要。”李光耀告诫的是海外华人，难道在大陆上的本土中国人就不该加倍警惕吗？

同年早一个星期（11 月 16 日），美国前总统布什也在香港发表演说，题目叫《大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冲击》，最后一段说：“我知道我们美国人经常会强调你们可以向我们学习什么。我们经常大谈我们的自由市场和民主制度，因为我们相信它们的作用。但是事实上，世界在变，当力量和财富扩散以后，我们可以也必须向你们学习，而这可能是我们的时代最有希望的一点。”“在西方世界，我们一直只谈权利，但是你们在亚洲、在香港这里以及其他地方，提醒我们繁荣与和平都有赖于个人的责任。”

西方人现在也要向中国人学习了，这些话听起来确实可以使人飘飘然。但是，我们也该扪心自问：难道我们真的已经把

市场经济正确运行的规则和民主法治的真谛学到了吗？学到可以从心所欲进行再创造的地步了吗？难道我们真的已经把列圣先贤教导我们的把社会责任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道德规范践履躬行“无丝毫亏欠”了吗？

民族主义是孙中山先生为使中国摆脱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压迫而提出的伟大目标。但是中国传统的理想却是“天下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所以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子夏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后人如顾炎武、王夫之特别区分“国”与“天下”的差别，置天下于国之上，以为国不过是指政权，而天下是指文化。所以美国汉学家列文森认为中国人的“天下主义就是文化主义，因为中国人古来并不重视异民族的肤色容貌，而只重视它的政教礼乐，所谓‘进于夷狄则夷狄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到19世纪末在列强环伺欺压下才产生的。因此，它只能是民族解放主义，而不能是民族扩张主义。在这个加速全球化的时代，在中国复兴而取得与世界列国平等的地位以后，中国的文化应该还是回复到文化主义与天下主义——在今天来说也就是全球主义。

当然，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虽然科学、技术、经济以至某些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的全球化已经灼然可见。但是文化是仅次于体质形貌而区分人类各个族群的最后标志。哪怕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先识之士相信物质生活的全球化必然要导致精神生活的全球化，例如1983年在蒙特利尔召开的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就十分强调“人类统一和世界文化统一的最高价值”。但是我们毕竟离这个阶段还相当遥远，这正是《文明的冲突》这样的文章得以在今天这个时候出笼的原因（虽然可以合理地希望不用再花上500年的时间了）。如果我们不以虚幻的愿望来

代替切实的行动，那么当务之急就是要振兴各民族的民族文化，并且从中发掘其最本质的，也必然是与其他各民族文化共同的价值观念，并且加速和加深使汉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融和，从而促使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逐步融入全人类文化的普遍性之中。

在这个加速全球化的时代，这本来是各民族都要做的工作。但是对中国人来说，这个事情特别紧迫，特别重要。道理是再简单不过了，就因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中国文化是世界绵延最久而又辐射甚广的文化。如果中华民族不能促进全球由混乱走向有序这个伟大的历史过程，它就必然要延迟甚至促退这个过程。是非利害，洞若观火。事实上，上面提到过的美国前总统布什在其演说中就曾提到：“人们想要知道……对世界其他地区而言，亚洲的兴起是祸是福？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在这些问题中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布什对这个问题作了十分干脆的回答。他说：“有些人在听到我上面说到亚洲的经济增长，并且举出了许多惊人的数据以后，会问这样的增长会使美国受害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亚洲伸张和中国的发展反而会使美国蒙利。”对外界的各种疑惧与期待，我们也可以作一断语，中国经济和文化的振兴，如果走的是沙文主义道路，那就一定是中国之祸；如果走的是全球主义的道路，那就一定是中国之福。还可以再加上一句：“中国之祸肯定是世界之祸；中国之福肯定是世界之福。”

在历史上，在亚洲的范围内，中国文化对比起周边国家来曾是一种强势文化，因而曾长时期博得它们“向风慕化”。但是，不容讳言，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对比起西方文化来，变成了一种弱势文化，因而中国人曾有过一百几十年向西方人（包括俄国人）学习的经历。这期间曾由于胡适说过一句“全

盘西化”的话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即所谓“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之论战，后来，胡适承认“全盘西化”一词有病：“全盘西化”是不可能的，应当改为“充分世界化”，这场论战才告停息。在 60 年以后的我们看来，“充分世界化”应当进一步发展为“全球化”。这不是一个咬文嚼字的问题，而是因为，在提充分世界化的时候，人们心目中的世界实际上仍然是西方的强势文化统治的世界，所谓“彻底世界化”还是逃不了向所谓“先进的西方”学习的实质。而今天则不但世界的“力量平衡”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事实上出现了超国家、超全球的全球性力量和全球性的问题，人们已经可以看到超乎东方、西方、南方、北方的全球性的要求。根据这种新的共同的要求，提出新的解决办法，这不是哪一个国家的任务，而这样的一种形势与要求实际上是所有国家的任务，也就是要由全球性文化来解决的任务。

这样的一种形势与要求实际上已经被当代世界各国所意识到了。上面引证的布什所谓向亚洲、向中国学习的话以及蒙特利尔哲学大会所谓建立全球统一文化的话就是证明。我们的邻国日本近 20 年来一直以“国际化”作为“贸易立国”与“技术立国”的出发点与归宿点，离我们更近的韩国近年来也大力倡导“国际化”。日本（产经新闻）今年 3 月底就韩国总统金泳三访华发表的报道就明确标出“韩国正在朝着‘全球’转换思路”。《产经新闻》指出韩国已经认识到，在今天的世界上，一个国家的外交仅仅着眼于这样那样的双边关系是远远不够的。多边关系已经越来越重要，而多边关系就是一种全球机制。

中国人只要回想 20 多年前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给我们带来的欣喜与因此而来的巨大变化，就不能不更加感到恢复我们

在关贸总协定（马上就要变成国际贸易组织）席位的迫切性。不过也许很多人没有理睬到，参加这样的国际经济组织，事实上也就是参加正在形成中的全球文化的创建。

上面说了许许多多的话，目的只是为了要说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以传统为基础，以全球化为目的。不以传统为基础，12亿中国人将失其统绪而又成为一盘散沙，那样也就无法参加已经开始的加速全球化的进程；不以全球化为目标，那么中国文化的建设又会走到我们刚刚在10多年来批判过的“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老路上去。

这样一来，讨论了100多年的体用之争也可以解决了：以全球化的普遍规律为“体”，以中国特色为“用”。中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验，自己的长处，参加为全球化的过程明道立法，制礼作乐，也就是确立规范的大业，也应当可以算是明体达用了。

我们上面提到日本和韩国都已提出以“国际化”为民族目标，而许多西方大国却似乎还未见有这种提法。看来它们也许自认为主宰世界多年，已经够“国际化”的了，然而就今天世界形势发展的速度与规模来看，实际上还是大大不够的，谁不能顺应历史的潮流，谁就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哪个民族能“先天下之忧而忧”才是真正的“先进民族”。

中国在这方面有比较好的条件。一部上下5000年的中国文化史事实上也就是以中原文化为核心与中国大地上各种各样文化通过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达到协调融合，终于形成今天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世界上的其他大国如印度、美国、俄罗斯以至德、英、法、西、意……大体上也都经过类似的形成过程，即使是比较小的国家，也无不经过类似的部族、民族协调融合的过程，不过范围大小不一，历史长短不一，结果生熟不一而